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与中国妇女

第一节 禁烟运动的拥护者

当中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个朝代清王朝经历了“康乾盛世”由盛至衰迈入危机四伏的 19 世纪时，地球另一方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着血腥的掠夺和剥削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人类社会进入了飞速发展变化的新时代。

19 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蒸汽机已得到广泛的使用，其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已远远超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成为世界头等资本主义殖民强国。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其本身的特性所决定，要求越出国界寻求广阔的市场，以获取尽可能众多的剩余价值。拼命开拓资本主义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把侵略、掠夺的魔爪伸向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

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英国资产阶级经过许多挫折和失败，终于寻觅到锁钥机关，打开了传统自然经济王国中华帝国的门

户，找到既可为中国社会接受又可以大赚其钱的商品，那便是鸦片。于是，罪恶的鸦片贸易迅速发展。鸦片的大量输入，为英国资产阶级赚取了血腥的暴利，同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鸦片泛滥很快，开始仅为纨绔子弟们的浮靡行为，后蔓延很凶，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等各阶层，乃至妇女、僧尼、道士，都有人在吸食。本来可适当作药用的鸦片竟成为精神病态患者的灵药良剂，有人竟“若到黑甜之乡，唤彼为引睡之媒，倘逢红粉楼中，借尔作采花之使”。^①开始此现象仅在广东、福建一带出现，后来江浙及更广阔地域都流行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如上海松江一带，“道光以前吸食者无多，季年以后，其毒乃不可遏，通衢列肆，嗜食者众。城市而外，寢及乡镇，一日之费倍蓰米粮，往往因之败业，以促其年，而且男女杂厕”。南汇一带还有花烟馆，名为夫妻店，勾引良家子弟，尤为藏奸之所。良莠无别，海淫海盗，莫此为甚”。^②烟毒似有种奇特的魔力，连禁烟立场坚毅、措施峻刻的厦门某官员的族内妇女也沾染此恶习，可见烟毒诱惑力之大和禁烟之难。

吸食鸦片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豸虎逼于后，亦惟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③“烟枪即铕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困死在高床”^④，令人神伤。更令人痛心的是“妇女亦有沾染嗜好者”，过着“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⑤的鸦片鬼生活。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较为开明的清政府官吏如林则徐等采取果断措施，严厉禁止鸦片的输入和吸食，维护民族权益和人民身心

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3页。

② 《松江府续志》卷5。

《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一）第318页。

《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六）第867页。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一第326、321页。

健康。这种禁烟活动，沉重打击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侵略利益，英国为鸦片走私的卑鄙目的而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华帝国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对各阶级阶层的妇女来说，反对外国入侵、争取民族独立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她们从父兄夫子的痛苦中，从自己的痛苦中，对鸦片产生了由衷的痛恨，与男子一道参加了反对鸦片毒害同胞的爱国斗争，成为禁烟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

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便以禁绝鸦片为己任，大力清查封禁，将收缴的烟土、烟膏搅拌以桐油然后烧毁，将烟枪等刀劈火烧，不留残迹 以免贻害群众。-

林则徐还注意采取有效措施挽救病入膏肓的烟民，他组织人配制了戒烟药丸，广为散发。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深得民心，当他路经民居时，有的老年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感谢林则徐拯救了她家的男子；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①老妇人表达了众多妇女的共同情感。

广大爱国妇女热情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尤值得提及的是，在他的身边，有一位辅佐他事业的贤内助郑淑卿。她是河南永城郑知县的女儿，16岁便与林则徐结为夫妻。到林家后她性情随和，手脚勤快，不久便适应了较为贫寒的婆家生活。林夫人温柔又贤慧，与丈夫情投意合，几十年中随林则徐四处奔波，照顾备至，不但承担起家务琐事，而且竭力为丈夫分忧解难，给险恶环境中奋斗的林则徐以极大的支持。后林则徐遭迫害，被革职流放伊犁，郑夫人考虑丈夫原本身体欠佳，又受到如此打击，只身赴边关，困难重重，凶多吉少，无奈自己患风湿症，已是自顾不暇，无法伴丈夫远行以慰其心灵，便率全家西行至西安，又让两个儿子伴随林则徐出关赴疆。林则徐郁闷不畅，加之恶劣环境影响，身心交瘁，郑淑卿不时寄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 第 598、601 页。

去家信问候，并作诗与丈夫唱和，及时地慰藉林则徐的心理，使他的身体不至垮下来。在新疆期间，林则徐在逆境中仍振作精神，为民族为民众作了一番有益的事业，这与林夫人的关切支持是分不开的。人们在崇敬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同时，应记住这位平凡的女性郑淑卿。

中国妇女深明大义，在民族危难面前表现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和献身精神。葛云飞将军在定海抗击英国侵略军战斗中奋勇牺牲，其母亲闻讯在悲愤中数颌其首，为儿子成为“天生忠勇超人群”的将才而宽慰自豪。

中国妇女是一支重要的爱国力量 她们的立场和态度 对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的妇女发誓同参加反抗侵略者战斗的丈夫生死与共，清军“平海营”管带林福祥的妻子陈漱霞即这样表示：“胜敌则与有荣施 捐躯则义不独活。”人们称颂她“夫君一旦去从戎 大义相随生死了。誓言直对白水盟 矢志高争明月皎”。^② 这等坚定的支持和鼓励，不仅对亲人是一种莫大的力量，对反侵略爱国斗争也是一种可贵的贡献。

第二节 “文明贩子”们的丑行

鸦片战争是西方国家同落后社会制度的清王朝之间的战争，但是，反动的侵略目的、野蛮的侵略手段十足地说明，西方殖民主义者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正义性均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这场战争的评论。

《近代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5 页。

②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第 304 页。

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马克思把鸦片战争称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是英国“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被视为“半野蛮”的中国人站在“维护道德原则”的立场，而所谓的西方“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①同样重视这场中英冲突的恩格斯专门撰文颂扬镇江军民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指出：“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他们“殊死奋斗，直到最后一人”。他对中国军人及其家属宁死不屈的精神也给予肯定。

同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文明贩子”“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②事实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是一伙丑恶的“文明贩子”。历史记下了他们迫害中国人民、欺侮中国妇女的卑劣嘴脸。

鸦片战争的每个阶段、每个战场都可以见到侵略者屠杀、蹂躏中国人民的血腥场面。中国妇女第一次大量地横遭外国强盗禽兽般的凌辱，作为其必然结果，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中国民众第一次普遍地产生了对外国侵略者的民族仇恨。

侵略军初犯沿海地区，在定海城乡四处骚扰，“在内港游奕者，遇女眷必被劫去。数十万生灵，如坐针毡，延颈待毙”。^③在定海、宁波，侵略军疯狂掠夺大量白银、丝绸、粮食，勒索军费120万银元，撤走时又劫持大批妇女，运到澳门囚禁起来，供他们糟蹋。被劫妇女啼哭，声彻楼下。^④闻者无不同情。

英国军队不断为所欲为，掠夺城市住宅，征召船夫苦力，酒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9—1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32页。

④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三）第341页。

⑤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六）第82页。

污辱当地妇女”因而“外国人所到之处 尽是一片惊慌和混乱”。^① 1842年5月,为利于集中兵力进犯长江,英国侵略军先行进攻海防重镇乍浦,其状极惨,而其最可惨者,尤莫如妇女,……有数人送淫而死者”。^② 19岁少女刘凤姑出逃,被乱兵阻回,她回家时被英兵尾随盯住,英兵欲施以非礼,刘凤姑不肯就范,“絮被匝身誓不屈,骂声痛把倭奴叱”。^③ 面对强盗,中国少女宁死不低头。

中国妇女采取了各种对付侵略者的行动。当侵略军全力进攻上海时,各家的母媳妻女纷纷出走躲藏,“少年女子,竟无一在家者”。^④ 消极避难方式不失为那种背景下有效的可取的御敌手段。

英国侵略者开始攻打镇江,遭到京口副都统海龄领导的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英兵以残忍手段进行报复,7月21日攻陷镇江后大肆屠杀、污辱中国男女。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惨不忍睹。城市妇女不甘被辱投缳、投井、坠楼、吞针、投河捐躯自尽者,自举人徐元佐妻以下共73人^⑤。均有姓有名见于记载,不见记载的则无计其数。海龄夫妻二人一起殉难。疯狂的侵略兵视杀人如儿戏,在京口城门外杀害妇女时其形宛如人执鸡鸭宰割,真是惨绝人寰。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一般是对社会人生丧失信心的消极行为。但是在敌人重压下,中国人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当时历史环境中以殉难为反抗手段,系应理解的崇高悲壮之举,是值得肯定的。

妇女的不屈态度给敌人以震慑。英军曾记载:有一满族妇女受伤被俘,“然而等她苏醒过来,刚能开口讲话的时候就把我们这班

①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② 朱翔清:《埋忧集》卷10。

③ 《鸦片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77页。

④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三)第157页。

⑤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三)第43—44页。

胜利者骂得狗血喷头’^①“文明贩子”被置于失败者的境地了。英国殖民者强占香港后，把鲗、鱼涌一带乡村房屋全都拆除，逼居民迁走，在那一带居住的七个结拜姊妹愤不欲生，就在涌前投海相抗争。此后这一地方便被叫做“七姊妹”，记下了中国人民对殖民者的仇恨。

在民族危难来临之际，中国妇女不退缩、不屈服，对外来侵略者的丑行表示了极为强烈的反抗精神，以大无畏的姿态迈入了近代中国社会。

第三节 妇女齐心亦健儿

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以争取走出家庭小圈子，走向社会生活，争取民主权利，争取男女平等为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妇女自身地位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伴随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出现而兴起而发展的。

不同于西方姐妹，踏入近代社会门槛的中国妇女，其传统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存条件并无大的变革，迎面而来的是外族的嚣张入侵，她们无法单纯顾及女性自身利益，不可能提出实现自身价值的独特要求，她们争取解放的斗争被融汇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之中，拯救民族危亡的紧迫任务成为爱国男女共同的重大任务，被压迫妇女开始接受剑与火的洗礼。

在中外历史上，任何重大的历史运动都少不了女性的参加，进步妇女从不会置身于时代洪流之外。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便展现了广大妇女的身影。投身爱国斗争成为中国妇女参加

上海历史研究所：《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中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99 页。

近代政治活动的肇始。三元里妇女以英勇的反侵略斗争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史的序幕。

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组织群众有效地抵抗着英国侵略分子。1840年11月，钦差大臣琦善到广东议和，力反林则徐所为，拆除海防，遣散水勇，广州四郊防备空虚。次年5月，英军深入省河，形势十分危急，群众激于爱国热情，再度奋起。

广州三元里人民的反英斗争是鸦片战争期间广东最大规模的一次反侵略战斗，当地妇女有突出表现。这场斗争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要抒发郁积的仇恨，要声讨作恶的入侵者。究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的近因，则同英人迫害当地妇女有直接关系。

大规模冲突之前，外国人在这一带为非作歹、迫害中国妇女的事就屡有发生，一次因买水果发生争执，外国船员竟由船上抛瓦罐将小贩郭梁氏击中，使这无辜女子不幸落水身亡，激怒了当地群众。1841年5月24日，英军攻占广州北郊后，这伙“文明贩子”到处掳掠财物，抢夺粮食，挖掘坟墓，奸淫妇女，作恶多端，甚至砍了妇女的小脚作为“俘获品”^①，气焰十分猖獗。一次侵略兵在沙洲头抢去渡船数只，将船上的老妇扔下水，将年轻女子奸污了，真是一副豺狼相。

5月28日，系农历四月初八日，为当地群众重视的浴佛节，农民韦绍光的妻子李春（一作李喜）到社坛祭拜时，不幸横遭英军的拦截调戏。三元里约有2/3的群众程度不同地受过英军的伤害，侵略者在这里积怨仇甚多，村民们“人人为之发指”。^②这次事发后，气愤至极的农民借着节日的酒兴，群起同英军搏斗，情绪格外激奋，当场便消灭了前来骚扰的敌军的大部。

30日晨，三元里附近103个乡的群众，包括社学、团练、秘

① 陈原：《略论三元里反侵略斗争》载196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②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四）第600页。

密会党、纺织业工人都行动起来，他们竖旗誓师北帝庙前，决心“旗进人进 旗退人退 打死无悲”^①，向被英军侵据的四方炮台进攻。当时适逢大雨降临，使敌人火药淋湿，枪炮失效，数万群众“刀斧犁锄 在手即成军器 儿童妇女 喊声亦助兵威”^② 场面激烈壮观。

当时战斗组织者安排妇女儿童疏散往西海槎头、潭村一带，但石井等处妇女主动热心操办饭食，隔数村亦来，放在路边供反英战士食用，有效地支援了战斗。“妇能执爨愿从征。”^③更可贵的是 平英团领袖周春妻子阿凤冲破封建礼教的羁绊，带动一些妇女成立娘子军，直接参加了战斗，男女协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在这次反侵略斗争中，男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妇女亦出门助战，她们的出色表现也为人们称道。

当时进步诗人张维屏曾写了题为《三元里》的诗篇，赞颂包括妇女在内的爱国群众：

“三元里前声若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
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武器。”^④

①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②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四第600页。

③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94页。

④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91页。

不仅在三元里，在其他地区的反侵略斗争中，也可以见到“踊跃同袍 子弟悉成劲旅 婉娈如玉 妇女亦能谈兵”及“壮女亦边才”的场面。^① 有的在时间上还早于三元里抗英。

1841年3月13日 英军入侵香山渡头村 抢夺财物 欺侮妇女 雷兆成等 10多名村民持农具等与英国侵略者搏斗，奋勇保卫家园，儒生雷成星妻子刘氏奋起执挺随众挞伐敌人，后战败遇害，年仅24岁，她是第一位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近代中国妇女。

爱国将领葛云飞于浙江定海率师血战三昼夜，战死于东岳宫，其妻某氏容止闲雅而富有胆略，闻讯后召集家人及余部数百人连夜攻入敌人营垒，夺回葛将军尸体妥善安葬。这等富有胆略的义举受到时人钦佩，有歌道：“不负将军能报国，居然女子也知兵。”^②

英军侵入长江下游一带 沿江人民处处给以打击 太仓、江阴的农民以竹竿、锄头袭击侵略分子，妇女、儿童也毫无畏惧地投身战斗 以石块等打击敌人 他们力弱志强 也是各尽所能了。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战争以中国方面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英国侵华的罪恶企图得以实现，中华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这时期的中国妇女远无法成为历史舞台的重要角色，她们与爱国兄弟们的浴血斗争也难以扭转社会的大局。虽然妇女的斗争在史籍中很少留下记载，绝大多数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但是从零星文字记录中不难感受到她们惊天地泣鬼神的不屈精神，她们处处表现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她们与男子一道共同展现了我们民族的风采，民族苦难为代价换取的必定是民族觉醒。

中国妇女的觉悟这时仅限于最感性的对外族入侵的反抗，与争取实现自身价值的意识尚十分遥远。这时期中国妇女的进步行动的意义在于：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步发展，中国妇

①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95、298页。

② 《清朝野史大观》·上海书店1981年版 第8卷 第119页。

女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解放运动。

第四节罪恶的“猪花”贩卖

通过鸦片战争，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强迫开放五口通商和协定关税，获取巨额赔款，并攫取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使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

除了与男子共同遭到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剥削外，中国妇女还要受到外国强盗在肉体上的凌辱和蹂躏。伴随劳动力商品化的妇女肉体商品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给中国妇女的见面礼。

1842年8月鸦片战争结束，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确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1843年，英国在上海设领事馆，上海正式开埠。

1845年英国划定黄浦江以西800亩土地为英租界。其后，美、法等国也在上海划定各自租界，又屡用“越界筑路”等手段非法扩大租界面积，在这种“国中之国”建起“十里洋场”。靠洋人为后台，刺激商业、旅游业等畸形发展的娼妓业有了迅速发展，在无数中国女子的悲伤血泪中，外国侵略者勾结中国反动当局，建立起他们的统治新秩序。

道光以前，上海城内还没有妓院，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城内才开始出现娼妓业，其经营方式沿袭江浙一带旧时官妓的习尚，崇风雅，多不宿娼，但也开始吸蜂引蝶。在租界建立前，上海该业发展不快，城内仅数十家妓院，一家一二个妓女。

租界建成，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叙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其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并进

之势”。^①40年代中期，租界内中外人口不足千人。50年代中期租界人口则达2万人以上。1860年租界人口达30万，两年后激增为50万人。这当中除外国冒险家外，还有江南一带避太平军而来的有权势有财富的逃难者，江浙等地的妓女也涌往这里，青楼之盛方成为可能。

租界当局的放任纵容是促使上海娼妓业繁荣一时的又一原因。洋人们深知此业在刺激城市发展方面的特殊功能，也亟欲分享中国女子的美色。这样，“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宫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②随租界不断扩展，妓院不断发展。至19世纪60年代，有一定知名度的妓院便有1500余家。据报道，华人住户的1/12竟以娼妓业为生，靠此业积资成富豪的颇有人在。上海建租界20年，娼妓业的发展达到惊人的程度。昼则锦绣炫衢，夜则笙歌鼎沸，灯红酒绿的背后掩盖了众多青楼女子的辛酸，外国入侵者的肉体压迫和剥削造成中国妇女无数的血泪恨。

自西方侵略者闯入中国沿海地区，许多蛋家（即船家）女人和洗衣女人被骗作泄欲工具，自从欧洲人到达中国沿海以后，“这些洗衣女人年纪很小就被买来训练过邪恶的生活”。^③“主要靠欧洲人生活”的这些弱女子陷入了黑暗的深渊，西方资产阶级给这些被称为“咸水妹”的女子带来的是“最明显的直接肉体剥削”。这类妇女的悲剧充满在中国近代妇女史中。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罪恶远不止于此。在侵华过程中，外国大资

①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____年，第296页。

② 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③（英）玲俐：《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④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第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____卷，第____页。

产阶级除垂涎中国的自然资源外，还十分注重掠夺中国的人力资源。鸦片战争后，外国人拐卖中国妇女出洋即贩卖“猪花”的问题成为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新兴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人口的买卖并不乏见，但这种交易受交通的限制，更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越出国界的范围。鸦片战争前，尽管已有西方侵略者在我海口拐卖儿童之事^①，但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中国人向外土移居，包括“猪花”贩卖在内的华人大量外移没有出现。中国男女大规模被拐卖往海外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西方殖民主义者久有的愿望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有了变成现实的条件，这种罪恶勾当始自鸦片战争后不久的咸丰年间，历经同治、光绪、宣统时代，直至民国初期还没有停止。这被称为“东方的三角贸易”，充满了血和泪。

近代出现的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有复杂的背景。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华推行强权政治，贩卖华工为解决海外一些地方对劳动力的急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美国独立革命后，北部首先实现奴隶解放，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随后英国、拉美各国相继发布奴隶解放令，奴隶贸易被禁止。解放黑奴运动后，西方热带殖民地劳动力顿时紧张，为确保植物园经营，在其他方面物色新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当务之急。17世纪以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产生把中国妇女引往其热带殖民地繁衍华人劳动力的愿望。英国甚至在1833年订有把中国女子移往英属圭亚那的计划。古老中国的大门在鸦片战争后被无情闯开，成为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新的劳动力的来源，殖民者的夙愿可得以实现。这是华人出国的外部原因。

其次，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外的自由接触日渐增加，使清政府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

制度下，农民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① 广东、福建等地人多地少，这种矛盾尤为突出。

最后，清政府的默认和支持也是促成华工出国特别是“猪花”贩卖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非法到“合法”，由一地到多处的重要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彻底破产，传统道德观念彻底动摇，清王朝统治者感到此举一则可以消除国内“乱萌”，二则可通过收取手续费牟利，所以对侵略者的行径很快由认识到支持，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保护华人（华工）出国。这样，贩卖“猪花”的问题愈演愈烈了。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845年，英国投机商德滴便在厦门开设洋行，专事掳掠华工出洋，华工们在酷刑下被迫签约，实际被剥夺了一切基本人权。这些被诬称为“猪仔”的劳工，是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下的奴隶，处境十分悲惨，被低价贩往世界各地。据外国学者研究认为，自1850年至1875年，便有128万多华工被运往古巴、南美和马来西亚的种植园和矿山，他们名为劳工，实际无异于奴隶，不堪折磨病死或自杀者极多，死亡率高达50—60%。^②

这类“猪仔”贸易的结果，使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形成清一色男性苦力为基础的华人社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为了稳定海外华侨社会的安定，加强男移民的定居程度，同时也为了繁衍劳动力，作为“猪仔”贸易补充的“猪花”贸易便发展起来了。

“花”系广东方言，系旧时代对一些特殊职业女性的蔑称，如称妓女为“花姐”，称烟馆女招待为“烟花”，称女理发师为“发花”，作为与贩卖男子相关的贩卖女子，也由“猪仔”引申出“猪花”这一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97页。

②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648页。

满诬蔑色彩的新名词。

处境比“猪仔”更为低贱悲惨的“猪花”其贩卖活动始于 50 年代初 殖民主义者“对妇女的作用颇感兴趣”他们充分而准确地预测了中国妇女给“华人社会带来的变化以及她们对华人社会和当地居民业已建立的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① 这些人贩子便从两方面加强诱使中国女子出洋。

第一，考虑到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有不携眷远游的习惯，西方人贩子遂利用娼妓和奴婢买卖制度，“以中国低贱价级的妇女作为所招女性出洋的主体”^② 熟谙中国国情的英国驻广州、厦门等地的领事认为“这类女子在本地可以随便买到，每年买一两百个装运出洋并不费事”^③ 1852 年前后 英国殖民主义者每年在厦门购买 100 至 200 名天足妇女运往海外。1854 年 殖民主义分子便将 600 多名中国妇女远卖往刚刚发现了金矿的美国旧金山，从事卖淫生意。这笔买卖获利高达 100 倍至 300 倍 极大地激发了其后的“猪花”贸易。西班牙政府在这年颁布的《钦定殖民法令》中明确规定从中国招募劳工往古巴，要“立誓随同运去一定数目的妇女”。^④

早期出国的女移民多数是这类“猪花”中国的娼妓、侍妾、婢女、养女等形形色色的地位卑下的妇女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急剧增加。如 1877 年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妇女有 1385 人 其中 567 人为娼妓、761 人为侍妾等，有妻子地位的仅 57 人 她们或作玩物供人取乐，或为工具供人役使，但到头来绝大多数人下场悲惨，不得不靠出卖皮肉维持生计。

第二，诱使华工家属出洋。1851 年的《英属西印度群岛在华招

① 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 新华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第 306 页。

② 《华工出国史料》第 1 辑第 98 页。

③ 《华工出国史料》第 2 辑第 15 页。

④ 《华工出国史料》第 3 辑第 30 页。

工传单》便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如有愿意携带妻子儿女的一概免收船费 除上述工资以外 对这样的人将给予少量附加工资。”

1860年 中英《北京条约》初次规定允许中国人出洋 专门开列的华工贸易条款规定：“凡有华民 情甘出口，……无论单身 或愿携带家属，……毫无禁阻。”^② 殖民主义者决非关心华工与家属分居带来的苦恼与不便，所考虑的是夫妻同行可稳定华工情绪，可增加定居人口进而生男育女，可保障劳动力的来源。

方便家属随华工出国的结果 造成从法律上为单身女子即“猪花”贩卖提供了可靠保障，这种罪恶活动遂由非法变为“合法”。1877年，清政府和西班牙政府签订的华工协定中规定了清政府对自愿出国的男女听其自便，全面认可了殖民主义者的罪恶经营活动。以前令单身女子装扮男子或藏于罗筐里偷渡的现象不见了，人贩子们更无所顾忌了。

中国妇女自沦为“猪花”那一刻 便陷入无边的苦海。这些妇女有的原本为侍妾、奴婢、养女等地位卑下的女性，到异国他乡仍摆脱不掉被侮辱被迫害的境地。有的妇女因家庭贫困受威逼利诱无奈出洋，如厦门德记洋行雇佣数百名歹徒专事以暴力掳掠妇女，使当地民众惊恐不已，妇女更是人人自危，香港等其他口岸也是人贩子横行，民怨四起。诱拐妇女是殖民主义者惯用的伎俩，诡称出国后可“穿金戴银 丰衣足食”，“冀多工作”^③ 使一批又一批单纯的女子中其圈套，成为其借以牟取暴利的猎物。

刚踏上远去的征程，出洋女子们便可见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狰狞之相，她们在外运途中的待遇与黑奴被贩卖的情景十分相象，都被当作货物塞进了船舱。1854年英国船茵格伍德号由宁波驶往

① 《华工出国史料》第3辑第3页。

② 《华工出国史料》第1辑第12—13页。

③ 转见《海外中国学专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

美洲 掠走 44 名女孩子，其中年龄最大的年仅 8 岁 统统被塞在一间小舱之中。葡萄牙人贩子马丁内兹 1855 年一次外运 47 名女孩，将她们装入“长度大约只有九英尺左右、宽顶多不出六英尺^①的船舱，女孩子浑身肮脏，为防止舱内透出恶臭气味，人贩子竟狠毒地把船板间的缝隙全部封堵起来，全然不管女孩子们的死活。

“猪花”运抵目的地后 成年妇女多被卖为侍妾 不顺从者则被逼为娼妓，未成年的女孩子多供买主无酬役使，至成年后仍难免被转卖为妾或娼。这些弱女子在异国的处境是很悲惨的。

在严酷的环境中，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贩卖往海外的中国妇女同黑暗势力及凄惨的命运进行了坚决的抗争。1905 年 广东顺德一姓潘的妇女被诱拐到暹罗，她誓死不为娼妓，从楼上跳下以示宁死不屈。这种斗争比较分散，影响也不大，无法改变这变相的奴隶制度，但这毕竟像夜空中的一阵闪电，申诉了为奴隶的中国妇女渴望获得自由的强烈欲望，呐喊出争取解放的呼声。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掳掠华人出洋，给中国社会其他的妇女也带来了其他的痛苦 在福建 广东一带因此出现的“过埠新娘”和“节妇”便是典型的两个例子。

东南沿海地区侨乡一些贫家女为生计常远嫁海外，婚前往往见不到男方，或无从了解男方的情况，单纯凭一张照片或媒人一番介绍便定终身大事，然后与公鸡拜堂，行结婚礼仪，再后便三五结伴出洋或由“水客”带到海外，与陌生的丈夫开始共同生活。多数“过埠新娘”命运不佳 常常中媒人的诡计，调包计 后面的真正男人往往不是年老、身残 就是穷得叮当响。若遇上行骗的“水客”或落入人贩子之手，那就更是叫苦不迭了。

至于节妇 则与“猪仔”直接有关。广东东部沿海一带男子出洋后，若已定过婚，其家人久待他不归，便要择良日迎娶其未婚妻过

《华工出国史料》第 2 辑第 131 页。